
“以时间换空间”

——阶层分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推动作用——

朱光磊

〈ZHU Guanglei, 南开大学〉

一、问题的提出

(一) “以时间换空间”的含义

中国大范围、高强度的阶层分化与重组已经持续了20年有余；大量的迹象表明，在21世纪初，也即在2020年之前，这一过程还将以相当的强度持续下去。这个过程将通过对社会成员构成的全方位调整，为中国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通过渐进的全面社会改革，逐步推进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赢得了赖以支撑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得以运作的巨大空间。

所谓“以时间换空间”，是指通过长达30—40年时间的社会阶层分化与重组，来换取中国社会结构的多方面的实质性变化，等待那些推动社会政治发展所必须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逐步成长，等待着庞大的农民群体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的逐步分解，从而换取长久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有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所必需的运作空间。

(二) “以时间换空间”与中国改革的基本特点

表面看起来，中国制度改革的速度比较慢，颇费时间，但实际上，中国的制度改革是稳健而周详的。这段时间，中国全面而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基本社会结构，——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运行模式和十多亿人口的社会构成，当然政治制度方面的变化相对有限。可是，恰恰是中国在经济方面和社会成员构成方面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为社会政治结构的有序变革奠定了它所必须的基础，缔造了建设民主和法治社会所必须的基本社会力量。

我们在急切地呼唤改革的同时，也要注意，改革的顺利推行需要一个相应的社会基础，没有相应的社会力量，改革不是不可以强行去推动，但是勉强启动的改革就难免会夭折，难免会畸形发展，也难以解决与经济发展和保持民生的稳定。没有民主不好；但是，民主畸形发展了也不好；民主畸形发展，而经济又没有上去，社会陷入混乱就更不好。

(三) 社会成员构成调整在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中介作用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的判断是正确的。综观人类历史，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一般都是政治发展的中心和政治科学最发达的地方。但是，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对数表式的关系，更不是一种绝对的同步关系，政治发展有时超前一些，有时滞后一些，有时也会有突变。二是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需要一定的中介环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社会成员构成的变化。经济发展不一定迅即带来政治生活的变化，但是它肯定立即改变社会成员构成，而社会成员构成的变化必然造成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

会关系的变化，终将造成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渐次变化，导致政治体制的改革。当一支政治力量努力推动社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推动经济形式的多样化的时候，不论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有关经济变化对社会成员构成的直接影响，意识到了这一变化对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整个政治发展的间接影响，这些影响都会发生。

二、六点基本分析

(一) 农民阶级的分化，既扩大了工人阶级和各种“新阶层”的发展空间，又从根本上压缩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非民主、非法制因素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基础。

农民的大分化，是20世纪末中国所发生的最伟大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大的也是比较保守的社会集团终于瓦解了。这一变化所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难以估量。从1979年到2001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下降了20个百分点以上，正经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从农业到工业、服务业的劳动力大转移¹；其中1997年成为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中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49.9%。²现在，原有农民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社会阶层，农业劳动者、农村知识分子、农村管理者等阶层成为农村社会结构中的主力部分。如果村民自治可以被称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的话，那么农民阶级的整体分化对中国政治发展就更具有了基础性的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 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工人阶级在中国的出现，形成了当代中国趋向于现代民主和法制社会的根本物质基础和基本社会基础。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中国工人阶级进入了一个以整合为主的时期。可以预见，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出现一个3亿人以上的工人阶级。拥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工人阶级，将成为中国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的物质保障。

目前，工人阶级的整合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不同阶层工人的边界模糊化。2. 不同阶层工人的利益要求趋同。3. 不同阶层工人的阶层归属意识趋同。4. 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的加入，使得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具有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军。到1997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就已经超过了1.3亿人，³比传统意义上的、主要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还要多；在城镇和工地、矿山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在2002年已经超过9400万人。⁴未来5年，农村劳动力到城镇打工将出现一个新的“高峰期”。

(三) 知识分子阶层的持续扩大和官员阶层年轻化、知识化的过程，削弱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主观条件，增加了建立民主和法治国家所必需的有效率的官员制度和相对独立的知识层的机会。

到90年代中后期，“脑体倒挂”现象基本消除，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非一贯化”⁵的态势得到了改善，特别是随着以信息业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教育、文化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知识分子队伍会进一步壮大，独立性也会逐渐增强。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公务员制度的逐步完善，官员阶层的“四化”过程正在加速实现。经过十六大前后的调整，31个省份党委书记的平均年龄为

57.9岁。《国家公务员招考条例》明文规定，年龄在35岁以下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公民才可以报考省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2001年，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工作的近1083.8万人，就聚集了社会中五分之一强的知识分子。⁶目前，他们基本上具备了接受现代政治和法律理念的主观条件。

(四) 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扩大，加大了我国承受各种社会动荡的空间和支撑渐进制度改革的社会力量。

随着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者群体正在迅速地扩大。这也标志着市场的和知识的因素等在社会分化中的影响正在迅速攀升。截止2002年6月底，城市家庭资产户均总值已达22.83万元，若以15—30万元为中等收入者划分标准，其规模大约超过2亿，占全社会人口的18%左右。企业家、专业人士、承包商、中高级企业管理人员、中高级政府雇员，以及文化个体户、教师、演艺人员中的一部分等，构成了中等收入者群体的主要成分。他们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和生产技能。他们认同市场竞争原则，追求个人的价值实现；政治态度较为温和，更倾向于通过民主的、温和的、合法的方式参与和推动政治发展，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重要平衡力量。他们大多受教育时间长，视野比较开阔，其多元心态和对各种事变较强的承受能力，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五) 各种与“市民社会”相联系的阶层的出现增大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弹性”空间。

现在，国家和社会已经不再是重合关系，“单位”的社会控制功能大大下降，社会成员的自主性也相对加强。在政府对于社会资源控制权的主动让渡中，与“市民社会”相联系的阶层不断出现。不论是“复新阶层”的出现，还是新兴阶层的发展壮大，他们都已经摆脱了传统农业文明和早期工业文明中敌对阶级间的“二元对立”和平面化的社会生活方式，进入了一个建立在经济形式多样化基础上的，阶级关系和阶层关系相交叉，社会关系趋向于复合型、多线性的过程，社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当代中国的初步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正在迅速壮大，相关阶层在总人口的比例正在不断升高。近十年来，仅在个体及私营企业的就业人数就翻了三番，从1991年的2491.5万人猛增到2001年的7474.1万人。⁷现在，注册了的私营企业的投资者就已经达到了400万人以上，如果再加上难以统计的“戴红帽子”（假公有制）的企业业主和事实上已经达到私营企业规模的少量个体大户的业主，中国目前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实际总规模已经非常可观了。此外，外资企业的中方员工、个体文化从业人员、承包商等，实际上也已经基本处于了政府的直接控制之外。即使是公有制单位的人员，单位的社会控制功能也有不同程度的削弱。“新阶层”的出现，增大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弹性”空间。

(六) “两栖人”的长期存在，为在一定时期内，淡化某些社会矛盾，减缓某些社会冲突，创造了虽然不理想但还是必要的社会条件。

“两栖人”就是指那些已经在事实上进入了新阶层，但又没有完全割断与原有阶级阶层的联系的人。“两栖人”现象是作为改革开放的伴生物出现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而在逐步消退。随着国家法制建设的发展，市场经济下各种社会管理制度逐步完善，这种公开地身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生存状态正在被瓦解。但是，事物往往都有两面性，在中国特

定社会发展条件下，“两栖人”群体的构成一度获得了它的时代规定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调动人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缓解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给人们压力等作用。

三、余论

(一) 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可以适当加快

由于世纪之交阶层分化方面的实际进展比预想的要快，我们有理由提出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20多年的改革开放，初步解决了中国下一个时期政治发展所要求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前提；20多年的社会阶层分化和重组，初步解决了中国下一个时期政治发展所要求的参与主体和领导者的形成问题。很多在前20年难以做到的事情，现在确实可以做了。

现在，情况确实也正在发生变化：“十六大”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一句话，已经调整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系列有关加强和改善“党内民主”的思路和措施正在积极地酝酿之中⁸；法官职业化的呼声已经为官方所基本接受；人大的政治作为的程度在逐渐提高；等。

(二) “以时间换空间”的原则应当继续坚持

但是，“以时间换空间”的原则步骤不宜打乱。循序渐进的总思路依然是正确的，“以时间换空间”的原则依然有它的特殊意义，要长期坚持。中国庞大的人口负担、比较低的经济与文化条件、相当大的东西和南北差异、特殊的外在压力的存在，使中国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推动社会政治发展成为必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与渐进式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使之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推动社会政治发展成为可能。

1 “我国农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20%”，《今日信息报》，2002年10月9日。

2 《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第107页。

3 侯波(1998)：“乡镇企业职工：一支新兴的产业大军”，《回顾与展望》，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第167页。

4 中国新闻网电：“去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逾9400万人”，2003年1月16日。

5 朱光磊等(1997)：《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第34—35页。

6 《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第160页。

7 《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北京，第140页。

8 参见林尚立(2002)：《党内民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